

西方分析的历史哲学与中国 近代史学理论的构建

叶 建

【提要】 20 世纪初,中国近代学人从译述日本的西方哲学史著述开始,初步介绍了分析的历史哲学的代表人物及观点,而后梁启超、李大钊等人又有更进一步的阐释。自 20 年代中期起,一批史学家、哲学家不满足于二手材料,强调从原著入手加以研究,这推动了西方哲学在国内传播高潮的到来。由此可见,西方分析的历史哲学俨然成为西学东渐中不可或缺的一道风景。因它与实证主义史学理论等存在差异甚至是对立,故其传播对当时占主导地位的进化史观、史学性质科学说等关键命题都有相当多的回应,这引发了时人的深入反思,推动了中国近代史学理论的深化。

【关键词】 分析的历史哲学 进化史观 历史解释

19 世纪中晚期,西方重新审视思辨的历史哲学体系,在此基础上,分析的历史哲学逐渐兴起。他们不再关注历史的进程、意义和规律,而是把眼光从历史本身转移到历史知识,转移到人的历史认识上来。以李凯尔特等为首的新康德主义和以克罗齐、柯林武德等为首的新黑格尔主义是这股潮流的重要组成部分。近代学人相继将分析的历史哲学思想输入国内,并对史学理论的建设产生了重要影响。本文拟从史学发展的角度,讨论西方分析的历史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及对近代史学理论的影响,以求教于方家。

一、西方分析的历史哲学的早期输入

1901 年,梁启超等人高举新史学大旗,倡导“史界革命”,认为中国传统史学“陈陈相因,一丘之貉,未闻有能为史界辟一新天地”^①,而海外史学理论“与本邦从来之习惯大异其趣”,将它们“介绍于同嗜者”,可“为他日新史学界之先河”^②。于是,国内既出现了《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这样的史学名篇名著,同时又出版了浮田和民的《史学通论》、巴克尔的《英国文明史》等海外名著的中译本。1908 年,仲遥在介绍德国史学时指出:“现存诸大学中,最有闻于时者,一曰列次,二曰德尔布留克,俱教授于柏林大学,三曰兰普列锡,为来

① 梁启超:《新史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中华书局 1989 年版,第 2 页。

② 汪荣宝:《史学概论》,《译书汇编》第 9 期,1902 年 12 月。

比锡大学教授,四曰波仑哈因,现为古斯弗瓦尔特大学教授。”^①而此前的张玉涛则认为:“近日欲研究现世社会之情状,惟有就学术上加以种种方法博采其证据,以会通其精神,此科学的史学所由起也。”^②即当时西方史学理论的发展趋势是以实证主义为主导。当然,在中国新史学构建发展的过程中也有个别学者将分析的历史哲学介绍到国内。1908年,仲遥在介绍康德和黑格尔在德国哲学史上的贡献时,将他俩身后的学术流变做了简单的回顾。他指出,黑格尔逝世后,“内部忽分为二,亦有可特书之价值者也。当时一派以海氏所谓理性为有意识者,因主张有神论,其派谓之右派,西鲁列尔为其代表;一派以海氏所谓理性为无意识者,因主张泛神论,其派谓之左派,斐耶鲁巴哈及斯土劳二人为其代表。”而康德辞世后,“有所谓新康德派者,其中最知名之士,曰兰格、曰李布曼、曰季耳。”^③但仲遥并未对这些学者的观点作进一步的介绍和分析。

20世纪10年代以后,日本思想界介绍西方分析的历史哲学的理论著述逐渐增多,1914至1930年间,李凯尔特《文化科学与自然科学》和《历史哲学问题》、克罗齐的《历史学的理论与实践》及狄尔泰的《精神科学导论》的部分章节都有日译本,其中重要的有田边重三译的《李凯尔特历史哲学》(东京大村书店1923年版)、羽仁五郎译的《历史叙述的理论及历史》(日本岩波书店1926年版)、三枝博音译的《精神科学序说》(日本大村书店1928年版)等。不仅如此,日本还出版了研究新康德主义的专著,米田庄太郎的《李克尔特的历史哲学》(日本改造社1922年版)、坂垣鹰穗的《新康德派历史哲学》(日本改造社1923年版)等便是。这些著述在当时的中国学术界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

李大钊、梁启超等都曾留学日本,通晓日语,他们率先研读海外分析的历史哲学的论著,并在国内发表研究心得,从而形成了近代中国介绍分析的历史哲学的第一波浪潮。

1922年,梁启超在题为“什么是文化”的讲演中,首次提到了李凯尔特对自然和文化的区分,“‘什么是文化’这个定义真是不容易下,因为这类抽象名词,都是各家学者各从其所抽之象而异其概念,所以往往发生聚讼,何况‘文化’这个概念,原是很晚出的,从翁特(Wundt)和立卡儿特(Rickert)以后,才算成立。……我们拿价值有无做标准来看宇宙间事物,可以把它们划分为两系:一是自然系,二是文化系。自然系是因果法则所支配的领土,文化系是自由意志所支配的领土。”^④随后,《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又再次提及了李凯尔特关于因果律的观点,虽没有对此进行介绍,但却阐述了与之相近的因果观,认为:“因果是什么?有甲必有乙于是命甲为乙之因,命乙为甲之果。所以因果律也叫做‘必然的法则’。‘必然’与‘自由’是两极端,既必然便没有自由,既自由便没有必然。我们既承认历史为人类自由意志的创造品,当然不能又认他受因果必然法则的支配。”^⑤可见,梁启超对李凯尔特的介绍,重点在借李凯尔特的理论以阐述自己的观点。

不同于梁启超,李大钊大体梳理出德国西南学派的学术流变,认为分析的历史哲学运

① 仲遥:《百年来西洋学术之回顾(续)》,《学报》第11期,1908年6月。

② 张玉涛:《史学研究法》,《学报》第7期,1907年8月。

③ 仲遥:《百年来西洋学术之回顾》,《学报》第9期,1908年2月。

④ 梁启超:《什么是文化》,《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九》,第97—99页。

⑤ 梁启超:《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〇》,第3页。

动的先驱者是翁特和郎普列希特,德国西南学派追其遗绪,强调“有学问论上主张历史学的独立”,其中文德尔班提出了文化科学的概念,但造成此派在思想界颇有势力者却是李凯尔特。李大钊虽承认李凯尔特的地位,但不完全赞同其观点,认为他主张的“历史学为一种事实学”,“依此绝非能将马克思认历史学为如同自然科学的一种法则学的理由完全推翻者”。在这里,日本学者铃木宗忠的观点对李大钊影响颇深。铃木宗忠指出,李凯尔特关于自然科学与文化科学的对立是有问题的,是需要加以修正的,其修正的要点“乃在关于科学根本的分类,承认理氏以对象为标准的对立,而由是引出其方法为标准的对立,即是把科学大别为自然科学与文化科学,而文化科学更分为历史学与组织学。”李大钊不仅大量转述铃木宗忠的观点,并表示“他根据这个理由,基本个人的主观把为学问的对象的现实界,分为自然与文化,于是以以自然为对象者为自然科学,以以文化为对象者为文化科学,此二者为科学的根本分类,由方法上考察之,其理益明”。^①

总之,20世纪20年代中期之前,仲遥、李大钊、梁启超等人借助日本学者译述的著作,已经向国内介绍了分析的历史哲学的相关理论。还应该看到,西方分析的历史哲学的早期输入由于不是直接源自英文或德文原著,是在引进日本著作的基础上开始的,而且,除李大钊对李凯尔特等的论述较为清楚外,其他类似研究成果尚不多见,史学界的关注亦有限,故此时中国学界对西方分析的历史哲学的真正了解还处于起步阶段。

二、输入和了解西方分析的历史哲学的新阶段

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国内一批青年学子纷纷留学日、英、美、德等国,其间不乏对西方分析的历史哲学有兴趣的人。贺麟回顾说:“我最感兴趣的是英国的新黑格尔主义者格林和美国的新黑格尔主义者鲁一士,特别是鲁一士《近代哲学之精神》和《近代理想主义演讲》这两本书对我启发甚大。”^②这批学者的特点,与前期梁启超等人相比,对西方学术有较深的了解,能根据原著进行研究和译著,并进而比较系统、全面地认识其历史哲学思想;同时,他们的相关成果在20年代中期以后陆续问世,介绍分析的历史哲学的第二波潮流就此出现。由于这些学者游历或留学地域不同及各自研究专业的差异,分析的历史哲学的介绍呈现出了多元的发展态势。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学术界陆续出版了谢颂羔的《西洋哲学ABC》(世界书局1928年版)、张东荪的《西洋哲学ABC》(世界书局1930年版)、李石岑的《现代哲学小引》(商务印书馆1932年版)、朱谦之的《历史哲学大纲》(民智书局1933年版)、黄忏华的《西洋哲学史纲》(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等一批介绍西方哲学发展史的著述,它们当中大量地涉及新康德主义和新黑格尔主义的历史哲学思想。

谢颂羔的《西洋哲学ABC》作为徐蔚南主编的ABC丛书的一种,对克罗齐曾有简单介绍,认为他“不主灵活,而主固定;凡事均加以严格的、确定的界说。他论美最多,一九〇二

① 李大钊:《马克思的历史哲学与理恺尔的历史哲学》,《李大钊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32—334页。

② 贺麟:《康德、黑格尔哲学在中国的传播》,《贺麟选集》,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453页。

年著有《美学》出版,为他生平的杰著。”^①该书作为入门的哲学史读物,内容简单,大量遗漏西方哲学史中的著名哲人及其观点,文德尔班和李凯尔特等为首的西南学派只字不谈。故在1930年被张东荪同名著作《西洋哲学ABC》所取代。后者扩充了很多内容,对德国的现代哲学和意大利的现代哲学都有相当篇幅的介绍,而且评价颇为中肯,如认为德国西南学派主张的是“真理的认识是一种价值的实现”,其对哲学的贡献在于“文化学”与“历史学”。^②李石岑的《现代哲学小引》是以国别哲学史下附学案体的形式介绍了德国的现代哲学和意大利的现代哲学,认为文德尔班和李凯尔特等为首的西南学派,继承了康德的价值概念,从本质上来讲应为价值哲学。其历史哲学是从价值概念延伸出来的,即研究“价值之学”而非“实在之学”^③,而克罗齐历史哲学思想则以“理性为根据”,认为“实在是有用的同时是合理的”^④。黄忏华的《西洋哲学史纲》是以李石岑、张东荪及当时海外学者的相关著述为基础,在内容上有较大的完善,不仅新康德主义学派中的德国马尔堡学派与西南学派、狄尔泰的精神科学派及意大利新黑格尔主义学派中的克罗齐与金蒂莱在介绍当中;而且对新康德主义和新黑格尔主义的演变脉络梳理得比较清晰,如新康德主义,“不独在康德底故乡德意志,而且绵亘全世界底哲学界。所以新康德学派底范围极广,可以分他做前期和后期,又可以分他做德国底新康德学派和德国以外底新康德学派。”^⑤而前后期新康德主义学派又有所不同,前期代表人物为朗格和李布曼,后期则相对比较复杂,其中主要有马堡学派、西南学派和柏林学派。

与上述的西方哲学史著述不同,朱谦之的《历史哲学大纲》是一本专门探讨西方历史哲学思想演变的著作。朱谦之历史哲学涵养较深,其在日本留学期间曾夜以继日地翻阅历史哲学著述,1921年出版的克罗齐的《历史学的理论与实践》等一批当时西方许多最新研究论著亦在阅读之列,故对分析的历史哲学的介绍在广度和深度上都有明显的提高。譬如介绍克罗齐的历史哲学观点时,他详实地分析了其“一切都是当代史”的论断,认为“普通以过去的事实为历史事实,却不知过去事实,须经过今我思想的活动,即将过去涌现于现在之中,而后才有存在的意义,所谓历史的现在,就是超越时间,不!就是包括过去现在未来的 Etenal Present(永远的现在)。”换言之,克罗齐是主张历史是人类当前精神与客观历史的结合,没有人类当前思想的参与,客观历史的内容就不再为人类所关注,也就只是一堆死的历史记录而已。不仅如此,这一论断还有着不可忽视的学术史价值和意义,“《历史叙述的理论及历史》一书,对于历史之时间问题,似乎较之柏格森更为精彩,更值得我们注意的。依他意思,‘一切真的历史,都是现代史’。”^⑥这些论述在当时来说,可谓是对克罗齐历史哲学一次比较系统的介绍,开时代之先河,但由于先有一套成见,对分析的历史哲学的评价又戴上有色眼镜,其具体表现就是把克罗齐的史学思想归于生命主义的历史哲学行列,与杜

① 谢颂羔:《西洋哲学ABC》,世界书局1928年版,第73页。

② 张东荪:《西洋哲学ABC》,世界书局1930年版,第103页。

③ 李石岑:《现代哲学小引》,商务印书馆1932年版,第105页。

④ 李石岑:《现代哲学小引》,第37页。

⑤ 黄忏华:《西洋哲学史纲》,东方出版社2007年版,第337页。

⑥ 朱谦之:《历史哲学大纲》,《朱谦之文集》第5卷,福建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251页。

里舒、叔本华、尼采、柏格森等人算为一类,这并不符合事实,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该书的学术价值。

进入20世纪40年代,部分学者既不满意分析的历史哲学的相关海外介绍著作,即便是那些比较优秀的论著,如卡尔的《克罗齐的哲学》和席勒斯比的《意大利现代思潮》仍然有诸多不足之处,同时又不愿停留西方哲学史这种概论性的研究状态,希望对分析的历史哲学的介绍和研究有所突破,故强调研读原著本身,进而从中提取精髓。在这一时期,对分析的历史哲学的介绍,主要有朱光潜的《克罗齐的“历史学”》[《大公报星期文艺》(上海)1947年第16、17期]及专著《克罗齐哲学述评》(上海正中书局1948年版)、王绳祖的《卡林渥德(R. G. Collingwood)的历史思想》(《思想与时代》第19期,1943年2月)等。

作为研究克罗齐的专家,朱光潜认为“最重要的事还是读克罗齐自己的著作”^①,并从中得到灵感,分析克罗齐史学思想的内在逻辑,进而更能接近于其本来面目。他认为,历史学在克罗齐的哲学中的重要性并不亚于美学,美学是它的起点,而历史学是它的终点。历史事实生展演变,连绵不断,新因于陈,陈纳于新,新者渐大,陈者亦不死,“历史叙述这生展演变,必运用思想,而思想必起于现时生活兴趣,必以现时心灵笼罩过去的事实,来解决现时呈现于心灵的问题”,所以“历史的对象必是‘永恒的现时’(the eternal present)。而一切历史必都为现时史。”在这个“永恒的现时”中,历史学自成一个完整、具体的圈子,也正是如此,历史事实能够向前发展,而且“总是由善到更善的进化”,这些特点决定历史学的职责在于“解释某人物和某事变在这进化中尽了什么功能,不在褒贬”。^②不仅如此,朱光潜还进一步反思了克罗齐的史学思想,如关于历史的单线发展与复线发展调和的观点,“始终在这牛角里钻来钻去,时而说历史只存于历史家的思想(独角主义);时而说历史家的思想受历史情境的决定”^③,仍然还是具有二元主义的倾向。因此在借鉴克罗齐的史学思想,是一定要突破这二元主义束缚的。

与此同时,作为新黑格尔主义在英国的代表人物柯林武德的历史哲学,亦引起了学界的关注。这方面的研究首推王绳祖。他时任金陵大学教授,对柯林武德的《历史哲学》、《人性与人类历史》、《罗马不列颠史》和《自传》等著述有接触和阅读,并以此撰写了《卡林渥德的历史思想》一文。在该文中,他对柯林武德的历史哲学思想加以介绍,着重分析了柯林武德“一切都是思想史”的论断,认为“事实是思想的表现。历史研究即以能表现思想的事实为对象。历史家所要研究的,不限于事实外形,尤特别注意于思想。归根到底,他只管思想。所以说:‘一切历史,是思想的历史’。(《人性与人类历史》)一切历史,是思想的历史。除了思想而外,没有其他可作历史智识的对象。”但思想因人各异,“前人的思想,经我心中,重行想过,虽是同一思想,然而与前人思想,确有不同。前人的思想,是他当时的思想。那个思想,今日虽是活着,而不显著。我思想前人的思想,身如临前人境地。”^④因此,

① 朱光潜:《克罗齐哲学述评·序》,《朱光潜全集》第4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306页。

② 朱光潜:《克罗齐哲学述评》,《朱光潜全集》第4卷,第374—375页。

③ 朱光潜:《克罗齐哲学述评》,《朱光潜全集》第4卷,第400页。

④ 王绳祖:《卡林渥德(R. G. Collingwood)的历史思想》,《思想与时代》1943年第19期。

史学研究要拒绝“剪贴式的历史”，不是一味抄袭前人著作与盲从权威，而是不断改写历史著作。这里，王绳祖对柯林武德史学思想的介绍，恰如其分地把握了其史学思想中最为精髓的部分，这在当时是非常难得的；同时，像如此系统介绍柯林武德历史哲学思想的文章，在此之前的中国学界是没有的。换言之，王绳祖这种研究是开研究柯林武德历史哲学思想时代先河的。

总之，从20世纪20年代中期起，学界对西方分析的历史哲学的传播进入了新的阶段。这与时人对西学引进方式的反思是密切联系的。齐思和认为：“西人之论史学原理，史学方法，历史哲学，见于英法德各国文字者，汗牛充栋，就中除史学方法已有定论外，其余皆见仁见智，因人而异。学者苟能博观约取，提要钩玄，著为一书，饷之国人之不谙西文而有志史学者，必大有裨益于中国史学之发达，可断言也。”^①换言之，主张要系统而又科学地译介西方历史哲学在内的学说，而不是稗贩、破碎、笼统地引进这些学说。事实上，这个时期，西方历史哲学的译介有哲学史性质的概述、专门探讨历史哲学问题的专著、专题研究论文等形式，译介者主要来自留学欧美、日本等国的留学生，其理论水平较之以往有了质的提高，故西方分析哲学的输入呈现出发展与深化的特征。

三、西方分析的历史哲学对中国近代史学理论的影响

西方分析的历史哲学对近代中国历史学及史学理论均产生影响。

首先，分析的历史哲学影响中国学者重新看待进化论，反思进化史观。19世纪末以后，进化论由严复《天演论》的译介而在国内产生了振聋发聩般的巨大影响，进化论的传播直接导致梁启超发表《中国史叙论》，次年，又发表《新史学》，积极倡导“新史学”。邓实、汪荣宝等人又从中积极响应，主张以进化史观为指导研究历史，同时也揭开了中国史学转型的序幕。^②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梁启超游历欧洲，阅读了新康德主义的相关著述，了解到了分析的历史哲学，并折服于其学说，据此对进化史观产生怀疑。梁启超说，他对“历史现象是否为进化的”这个问题，“本来毫无疑义，一直都认为是进化的”，但自看了李凯尔特等人的著述后，对历史进化论中的公理公例、因果律都产生了疑问。他讲到：“孟子说：‘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这句话可以说是代表旧史家之共同观念。我向来最不喜欢听这句话（记得二十年前在《新民丛报》里头有几篇文章狠驳他），因为和我所信的进化主义不相容。但近来我也不敢十分坚持了。我们平心一看，几千年中国历史，是不是一治一乱的那里循环？何止中国，全世界只怕也是如此。”^③梁启超对进化论的怀疑，引起了当时学人对进化史观的反思，这也是梁启超本人也被人认为“善变”的原因之一。其实，对进化论的反思并非标志着“倒退”，如果从了解分析的历史哲学的角度而引起对进化论的重新判断，这只能说是我们对西方学术思想了解的更多也更全面了。此后，更多的西方历史观点也纷纷传

① 齐思和：《评十九年出版各家史学新著（上）》，《国闻周报》第8卷第3期，1931年1月。

② 张越：《进化史观对中国史学转型的促进和影响》，《求是学刊》2003年第1期。

③ 梁启超：《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〇》，第5—7页。

入中国,如何炳松说:“彼曾习统计学者,以为研究历史应用统计法焉;彼曾习生物学者,以为研究历史应用进化说焉;彼曾习自然科学者,以为研究历史应用因果律焉;彼曾习经济学者,以为研究历史应用经济史观焉;彼曾习伦理学者,以为研究历史应用分类法焉。一时学说纷纭,莫衷一是;大有处士衡议、百家争鸣之概。”^①

其次,分析的历史哲学进一步加深中国学术界对历史学性质问题的认识。西方实证主义史学认为,史学是与自然科学没有差别的一门科学。这一观点于20世纪初传入国内,并在相当长时期里居于绝对主流地位。作为近代史学理论的奠基者,梁启超在1902年就已经接受了史学是科学的观点,认为“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②到1922年,通过翻阅李凯尔特等人的著述,他对作为判断史学是否是科学的因素,诸如因果律等产生质疑,指出“谈学问者往往以‘能否从该门学问中求出所含因果公例为‘该门学问能否成为科学’之标准’。史学向来并没有被认为科学,于是治史学的人因为想令自己所爱的学问取得科学资格,便努力要发明史中因果,我就是这里头的一个人。我去年著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内中所下历史定义,便有‘求得其因果关系’一语,我近来细读立卡儿特(李凯尔特)著作,加以自己深入反复研究,已经发觉这句话完全错了。”进而他修正了原先的观点,认为“史家的工作,和自然科学正相反,专务求‘不共相’”。^③梁启超对史学性质的反思,极大地刺激了后人的探讨热情,以致他们在论及该问题时,或多或少都要涉及其具体观点。^④换言之,梁启超开启了长达近一个世纪的史学性质是科学还是艺术的争论。

再次,分析的历史哲学促进中国史学界在史学理论层面上关注历史叙述与历史解释。20世纪前半期,实证主义史学理论著述大都将史学研究法作为阐述的重点,甚至像卢绍稷径直认为:“盖史法者,史学之所赖以建设而成为一科学也;无史法,则史学不能立。”^⑤就史学研究法的内容而言,史料考证与历史叙述与历史解释是其中非常重要的部分,然而当时史学概论或历史研究法著述,大都偏重史料考证,甚者直接说史学即史料学,“史学的对象是史料,不是文词,不是伦理,不是神学,并且不是社会学。史学的工作是整理史料,不是作艺术的建设,不是做疏通的事业,不是去扶持或推翻这个运动,或那个主义。”^⑥也正因如此,陆懋德的《史学方法大纲》中对“论解释”一篇所落的笔墨(共29页)几乎和“论考证”者(共31页)相等,从而使历史解释与历史考证平起平坐,故被评价为“就非史观派的方法论而言,实属史无前例”^⑦。然究《史学方法大纲》“论解释”篇,是与克罗齐有一定联系的。陆懋德在书中指出,克罗齐关于历史著作与现实生活区分的论断,“甚为精到”,“盖人类所作

① 何炳松:《通史新义·自序》,《何炳松文集》第4卷,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86页。

② 梁启超:《新史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第10页。

③ 梁启超:《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〇》,第2页。

④ 详情参看蒋俊:《中国史学近代化进程》(齐鲁书社1995年版);张越:《五四时期中国史坛的学术论辩》(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等。

⑤ 卢绍稷:《史学概要》,商务印书馆1930年版,第145页。

⑥ 傅斯年:《史学方法导论》,《傅斯年全集》第2卷,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308页。

⑦ 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岳麓书社2003年版,第490页。

任何事故之纪录,皆是记载,亦即是史料。然必应用现代眼光及现代主义,加以研究组织之工作,而后可谓之历史。故历史之做成,虽取材于各种记载,而实与原来之记载大异。盖过去的记载,不必全有研究的价值,而研究的价值,全在适应现在之需要。做历史者自必注意当时与现在的关系,而用以做为历史,方能适应现在之需要。由是言之,历史是有时代性的,不但已往的记载不是历史,即已过的历史亦不是历史。”这里,陆懋德通过分析克罗齐的观点,已经注意到了历史著述具有时代性的特点。故进而指出,“能于历史问题内事事必须问到底,则自能不为浮浅之说所蔽,而后知所谓历史的考证及历史的解释二种工作,实皆由此而起。凡欲问史料之真伪虚实,是属于考证的工作;凡欲问史事之因果变化,是属于解释的工作。”^①换言之,陆懋德认为历史著述的时代性,会造成历史著述需要不断重写,而这就要求后来史学家对历史解释进行反思和检讨,于是它便成为史学研究法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然而,西方分析的历史哲学的传播对近代史学理论建设的影响,并不具备与实证主义史学理论相提并论的程度。从其传播过程来看,分析的历史哲学的介绍者大多是哲学家而非史学家,李石岑等都是当时声名显赫的哲学家,其中个别与史学家交往甚密,如张东荪与梁启超,但总体而言,哲学界与史学界间的联系,在民国时期并不紧密。因此,哲学界介绍西洋哲学史的相关著述对史学界的影响有限。而就介绍分析的历史哲学的史学家而言,与实证主义史学理论的追随者相比,人数上劣势明显,仅梁启超、朱谦之、李大钊等数人,但即便是梁启超等人,对西方分析的历史哲学的介绍也只是其自身理论研究的一小部分,而非重点所在。例如李大钊对李凯尔特介绍,主要是在《马克思的历史哲学与理恺尔的历史哲学》一文中,而这又仅为《史学思想史》众多章节的一章;不仅如此,李大钊作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李凯尔特的观点是构建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一部分,“因为有了他的学说在普遍的科学原则之下,史学的特殊性质愈益明了,其结果又把历史学对于自然科学的独立的地位愈益提高,在史学上,亦算是可以追踪马氏的一大功绩罢了。”^②

(作者叶建,温州医学院社会科学部副教授;邮编:325035)

(责任编辑:张文涛)

(责任校对:李桂芝)

① 陆懋德:《史学方法大纲》,独立出版社1945年版,第3—5页。

② 李大钊:《马克思的历史哲学与理恺尔的历史哲学》,《李大钊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32页。